

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中之「台灣女性圖像」研究

姚村雄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商業設計系

e-mail:yaotsun@ntit.edu.tw

(收件日期:91年02月18日；接受日期:91年07月30日)

摘要

本文主要以質性研究方法，針對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中之「台灣女性圖像」進行分析、探討；並以「藝術社會學」(Sociology of Art)角度，從設計作品形成之背景資料中，進行有關「台灣女性圖像」表現之分析、描述與詮釋。也就是運用質性研究中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歸納方式，對田野調查所得之各項資料進行分析、歸類與描述，並進而詮釋各種「台灣女性圖像」在當時美術設計所顯現出來之現象與意義。經由本研究之進行發現，在殖民社會環境下，當時美術設計作品中的台灣女性圖像，可大致整理歸類為：儒教道德制約下的台灣傳統女性圖像、殖民同化政策下的典型日本女性圖像、社會變遷下的新時代女性圖像、戰時體制下的殖民女性圖像等各種不同類型。此外，透過這種對於美術設計中「台灣女性圖像」的歸類與分析，則能更清楚地詮釋在殖民環境變遷下台灣女性形貌之變化與發展歷程，以及這些圖像符號在設計作品中所傳達之社會訊息與意涵。

關鍵詞：日治時期、美術設計、女性圖像

一、前言

日人的對台殖民統治，不僅促使台灣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的明顯變化，亦對台灣人民之生活、文化有深入的影響。日治之後這種社會、文化的重大變革，使得一向處於社會邊緣的台灣女性，在殖民政權統治下自然也面臨了某些轉變與衝擊，而台灣女性的身分定位與角色扮演，亦隨著各階段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有不同的面貌呈現。透過當時美術設計中相關「台灣女性圖像」視覺符號的運用表現，一方面記錄了社會環境變遷對女性傳統形象的影響變化；另一方面則透露在傳統與外來文化並存的殖民社會中，「台灣女性圖像」在設計表現詮釋之發展歷程。

西方藝術社會學者豪澤爾(Arnold Hauser)認為，藝術與社會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係，任何藝術品都可說是特定社會與歷史環境下所形成的產物。當時代的社會環境背景不僅會影響

響作品表現的形式、風格，透過藝術作品更可以瞭解當時社會機制與社會環境的發展與特徵，也就是從作品的形式風格變化與表現主題運用，能夠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社會脈動、流行思潮與人們的審美趣味(註 1)。他在《藝術史哲學》一書中，更明確地指出：「藝術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因為藝術是人所創造的，而人是社會的產物。」(註 2)由此說明了藝術發展與人們所處之社會文化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古視覺藝術範疇中的美術設計，由於具有明確地功能與目的，所以其與人們生活的社會環境更是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只與其服務的人群、社會彼此互動，更隨著大環境的時代脈動而發展。所以，設計與社會兩者之彼此影響，應當是具有同時性、相對性與互動性，美術設計唯有落實於社會文化脈絡中，方能顯現其意義，因而透過設計形成之社會背景資料的分析，將能有助於對作品內涵意義之詮釋與瞭解。

因此，本文首先以田野調查方式進行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作品與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其次，並以「藝術社會學」角度，從作品形成之社會背景資料中，進行有關台灣女性之視覺圖像的分析、描述與詮釋。也就是運用質性研究中的「紮根理論」歸納方式，對田野調查所得之各項資料進行分析、歸類，並進而詮釋設計作品中的各種「台灣女性圖像」所顯現之現象與意義。所以研究過程中，除了瞭解殖民政權下台灣社會環境發展與台灣女性生活情形，以及其對於設計作品中「台灣女性圖像」表現之影響外，經由圖像符號的範疇歸類與分析，則能更清楚詮釋古殖民環境變遷下台灣女性形貌之變化與發展歷程，以及這些圖像符號所傳達之社會訊息與意含。

二、殖民政權下的社會環境發展

1895年日人治台之後，即隨著環境變化積極對台灣推行各階段的殖民政策，其對台灣的殖民經營目的，與當時其他西方帝國主義者一樣，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著想。所以，日本期望於台灣的，不只是豐富資源的榨取和日貨產品的銷售市場，更期望它成為「經略南洋」、「染指華南」，以及「進軍東亞」之軍事跳板，或拓展其帝國夢想之基地(註 3)。由於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跨出侵略之後所獲得的第一個戰利品，因此古毫無海外殖民經驗的情形下，台灣遂成為其建立殖民模式之實驗地，以及日人殖民政策執行的首要對象。

日治之後，台灣的政治型態、社會結構、經濟體制以及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皆因政權的轉移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改變。綜觀日本治台 50 年期間，其殖民統治方針，因受國際局勢、日本國內政情以及台灣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而有下列各階段的發展：

2-1 初期的安撫階段(1895-1918)

日治初期，未曾有殖民經驗的日本，對於台灣這個陌生的殖民地，以及具有傳統漢族文化的台灣居民，尚不知該採取何種統治方式。並且，當時台灣到處抗日活動不斷，日本除了派遣軍事將領山資紀為首任總督，以武力鎮壓平息暴動外，更古全台各地部署統治機構，鞏固開發基礎，藉以建立其「殖民地體制」。此外，為了「安撫」居民，以儘早步入殖民統治之正軌，

對台人原有之傳統生活與風俗習慣，除認為有礙政治者外，皆予以暫時延續，以順應民情，一切皆以建立台灣殖民體制之基礎為首要(註 4)。所以，此階段日本對於台灣的殖民方針，即以「安撫」政策為計，進行漸進式的榨取台灣與同化台人。

日治之後的台灣，除了政治環境的改變外，不同形式的文化、生活，亦緊跟著日人而滲入，這種外來的文化刺激，也對台灣傳統民間生活造成了明顯的衝擊與影響。例如日人為了儘早建立其殖民統治的基礎，以及配合殖民工作之順利推動，領台之後即積極在殖民地台灣籌設新式的教育機構，以達殖民教化之目的。所以首先在「同化教育」與「隔離主義」同時並行的教育政策上，加強台民日語的普及推行，利用語言同化以改善殖民地人民的認同，並廣設國語(日語)學校，培養具備現代化日本精神之順民，以利殖民政策之進展。透過當時日人在台所執行的現代化基礎教育，不僅達到同化台人、提升殖民大眾之素質，更使傳統儒漢教化下的台灣大眾得以接觸到不同於以往的日式文化與西方文明，並把西方的新式思想、觀念帶入了台灣傳統的農業社會中。

2-2 中期的同化階段(1918-1937)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瀰漫著民族自決思潮之際，台灣也進入了殖民經營穩定的日治中期階段。此外，由於世界潮流的趨勢、日本國內政局的蛻變以及台灣民族思潮運動的興起，日人的對台殖民統治政策因而也改弦更張，以應付遽變的整體局勢，於是自 1919 年派官總督田健治郎治理台灣。他甫一上任就宣佈解除長期以來的對台武力鎮壓，並採取「同化政策」及「內地延長主義」籠絡台人，以便於順利統治台灣；所以轉「安撫」為「同化」，大談「一視同仁」、「內台一如」，明文管制舊有生活習慣，希望改造台灣成為真正適合於日本人的殖民地方，並有計劃地在台灣引進日本文化，灌輸台灣民眾效忠皇室及對國家盡義務之傳統日本精神(註 5)。

此時台灣的武力抗爭已趨平息，各項建設持續進行並有初步的成果，例如自日人殖民教育實施下，台灣民眾的識字程度普遍提昇，到了 1926 年台灣兒童入學率已達 29.02% (註 6)；並且，各類藝文活動也日益蓬勃興起，由官方主導的「台灣美術展覽會」，以及民間團體發起的「台陽美展」，也分別自 1927 年、1935 年正式開辦。此外，自國際民族思潮思想影響下，台灣民眾對日本長久以來不合理的殖民統治方式漸生不滿，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之知識分子，更利用各種不同於以往的社會、文化運動，以爭取台灣人自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平等待遇。例如 1920 年蔡惠如、林獻堂等人於東京結合台灣留學生組織了「新民會」，1921 年醫師蔣渭水、林獻堂等人更在台北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藉以喚起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啟蒙殖民地民眾的現代知識與自由民主思想。

2-3 晚期的皇民化階段(1937-1945)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國力消耗至鉅，亟需台灣全力加入戰局，以台灣的人力、物力支援作戰；並且，為求穩定殖民地秩序、掌握人心，恐台人於此時藉機掀起反抗，於是日

人又進一步對台加強「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實施激烈的全面日本化同化政策，務使台人從精神上徹底消滅漢民族意識，並驅使殖民地人民能「義勇奉公」地效忠天皇。所以，為使台灣民眾脫離傳統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於是更加積極推展日本文化於台人生活中，藉此根除一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以達皇民化之終極目標。

除了對殖民地民眾思想、生活改造的皇民化運動計畫進行外，在戰爭至上政策的前提下，除了將全台人民悉數編入「皇民奉公會」，使全民的精神、行動上配合國家聖戰之需求，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兵力不足，總督府乃於 1942 年 4 月開始在台灣實施志願兵制度，以補充軍源；從 1942 年到 1944 年的 3 年間，共有 1 萬 7 千多名台灣人及原住民以「陸軍特別志願兵」、「海軍特別志願兵」、「高砂義勇隊」等名義被徵召投入前線戰場(註 7)。戰時體制的經濟亦以支援作戰為目標，加強作為戰爭後盾的台灣工業生產與物資開發，並統一控制、分配各種民生物資，完全榨取了全島可用之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其瘋狂的帝國軍閥侵略行動中。並以「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基地化」作為戰時統治台灣之基本政策，將台灣納入帝國聖戰之動員範圍內，作為其實現「大東亞共榮」夢想之侵略基地與南進跳板。

三、殖民社會環境下的台灣女性生活

台灣早期移民大多來自大陸閩、粵沿海一帶，所以其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皆延襲自於大陸原鄉的漢族傳統。這些傳統的生活型態，雖然在日治之後受到各種外來文化的刺激、衝擊，但卻能相互融合、影響，而呈現了閩南式中國傳統文化、典型日本文化，以及經由日人傳入的西方現代文明等不同生活文化同時並存之現象。

由於以儒漢思想為中心的傳統文化在在台灣民間生活根深蒂固，所以終清一世，乃致整個日治時期，傳統儒漢文化規範下的家族制度仍然是台灣社會的運轉核心，此種以父系繼嗣為主軸的家族模式，對婦女家庭生活有至深的影響。在傳統父權為主的思考模式下，台灣婦女從小即被灌輸了以男性為主的「男外女內」、「男尊女卑」的服從觀念，並且扮演男性權力社會依附者與兒育女等家庭生活維持者的角色。

日治之前，雖有私塾學堂提供一般民眾識字習經的途徑，但在「重男輕女」父權社會的歧視下，除少數上流家庭的女孩外，大部分台灣女性甚少有機會與男性一般接受教育學習的機會。日治之後，日人統治者基於「同化政策」及「實用主義」的需求，而開始在台灣實施新式的殖民教育，並以國語(日語)與實業科目的學習作為施教重點；因此，1897 年即在「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設立「女子部」招收台灣學子教導日語，使台灣女性開始了正式進入學校學習。而 1919 年公佈的〈台灣教育令〉，更進一步確立了殖民地台灣的教育制度與實施方針，從其中有關女子教育的第四點：「女子教育的整備在打破本島人陋習上發揮效果」內容中，顯示日人欲藉女子教育之實施以改善台灣社會的舊有陋習(註 8)。所以，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實施，不僅使台灣女性接觸了現代知識、文明，而啓迪了她們的視野、觀念，更使其能夠參與家庭之外的生活空間與社會活動。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即積極吸取西方文明之長處，企圖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並

使日本邁入現代化國家之列，舉凡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文化、思想等皆為學習的對象(註 9)。在日本殖民的威權統治下，作為殖民地的台灣，此時更理所當然成為日本模仿西方文化的試驗地，而使台灣因此得以接觸到西方文明，促使了台灣社會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在這種環境下，台灣婦女除了能夠接觸到殖民統治者帶來的日式生活文化，更受到經由日人而來的西方現代文明所影響。她們不僅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以增進各種基本的生活知識與能力，並且更因而拓展了她們的生活空間與社會參與；有些甚至更能依照個人的興趣與專業，選擇自己的未來發展方向，例如在殖民教育的現代西方文明洗禮下，有許多台灣畫家如顏水龍、李石樵、楊三郎等人都在 1920 年代陸續赴日學習美術，然而來自新竹的陳進(1905-1998)，卻是當時少數的台灣女性畫家，她在 1925 年即獨自遠赴日本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就讀，開啓了台灣女子突破傳統女教的約束，堅持在藝術創作上追求個人理想與成就的先聲。

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使台灣能全力配合殖民帝國日本的對外作戰，除了以強大國家力量動員台灣的人力、物力，並且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務使台灣民眾能從內心培養日本皇民精神，激起一致效忠天皇、支持聖戰之忠貞愛國情操。當時台灣女性除了在學校課程中加強配合時局之射箭、劍道等強化體能、增進愛國精神的訓練外，更需參與各種社會服務、戰爭宣導等戰時勞務活動。例如戰爭時期總督府為加強皇民化政策的宣導，除了成立「台灣皇民奉公會」以作為執行指揮中心外，並將台灣女性組成「愛國婦女會」、「愛國少女團」，以及未婚女性知識分子為主的「括梗俱樂部」，進行戰爭慰問、獻納金募捐、國語普及推行、徵兵宣導、戰場後方秩序維持…等義務性工作(註 10)。其次，在戰爭進入緊張情勢後，除了徵召台灣男性青年加入戰場外，更動員女子成立「勤勞奉公隊」以代替男性勞力，進行農業、礦業、工業等增產報國的工作(註 11)。此外，有些台灣女性於戰爭末期亦被日人強迫徵調到前線戰場從事傷患救助的醫療服務工作，而有的更不幸淪為慰勞婦之悲慘命運。

四、美術設計中的「台灣女性圖像」表現類型

4-1 儒教道德制約下的傳統女性圖像

日治之前，台灣社會的發展大致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內涵，並有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下，形成一種以儒教道德為依歸的「儒漢化」傳統社會。此種傳統社會十分重視禮治秩序，各種人際關係均以五倫為原則，對於男女兩性關係的建構有著明確規範，並在淵源流長的歷史沉積下，形成了以父權社會為主的「重男輕女」的價值觀，男性成為對外發展並具有社會化行為的主體，女性則被視為權力意識的依附者。由於女性的從屬地位自古即被確定，女人並無獨立人格，只能處於被動的依附位置，而其動靜行止，亦受「三從四德」的強烈規範。在此種傳統社會中，女性自幼即被教導學習家庭瑣細雜務的工作，除了養兒育女之外，還包括有日常的廚房事務、縫製女紅、奉侍公婆、灑掃洗滌、家庭手工…等各種事務，家庭成為其主要的生活中心與活動空間。所以，台灣女性就在這種傳統儒漢社會的文化約制下承襲古訓，以「主中饋、侍奉舅姑、事夫、養育子女，勤力女紅為主要的日常工作」，養成了當時日人眼中的「美德」

—早起、勤洗滌、勤勞作(註 12)。

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雖然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以及殖民統治者的同化改造，而有嶄新的明顯變化，但傳統儒漢文化仍根深蒂固於民間生活中。當時雖有了女子教育的形成以及現代文明的輸入，但大多數的台灣女性仍然依循傳統，而肩負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工作；且殖民統治者的女子教育目標，也是以中國的四德為中心，融合了人和民族的封建教育，涵養婦德、培養溫良恭儉的賢妻良母和忠貞不二的日本皇民為原則(註 13)。因此，這種具有傳統美德的台灣女性圖像遂時常作為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之表現主題，成為傳達台灣意象之視覺符號，例如日治時期日人發行用以介紹台灣的繪葉書(圖畫明信片)，即時常出現辛勤工作中的台灣傳統婦女圖像(圖 1、2)。透過這種傳統台灣婦女圖像的設計表現，不僅可以強調殖民地台灣的傳統意象，並容易讓人對殖民地台灣產生識別、認同的效果，所以這種視覺圖像，在與台灣主題相關的美術設計或是有關台灣特產商品之促銷宣傳中，更是使用非常頻繁。在殖民統治者眼中，最典型的台灣傳統婦人形象，往往是勤儉持家、勞動操作的純樸農家生活模樣，因而這種女性圖像便時常出現於各種官方宣傳品或有關台灣之美術設計作品中。例如在日治時期的《民俗台灣》雜誌中的「台灣圖繪」，即有許多描寫傳統婦人日常操持家務的插圖設計(圖 3)；而介紹台灣氣候環境的《常夏之臺灣》一書，則以婦女在溪邊洗衣的傳統台灣農村景象，作為封面設計之主題(圖 4)。有些以家庭主婦為主要傳達對象的肥皂、醬油等商品廣告，更常直接作辛勤家務的婦女圖像設計(圖 5)。除了日常家庭雜務外，台灣婦女有時也需參與農田工作，協助男人從事各種瑣細的農田雜務，除犁田、耕種等以男性為主的粗活外，播種、鋤草、收割、採茶等工作，則往往是婦女必須協助的農事，例如 1942 年前輩畫家林玉山繪製的「嘉義郡改良蔗作」宣傳海報，即是以在蔗田辛勤工作的台灣婦女，作為設計表現之主題(圖 6)；台灣茶商公會發行的「台灣茶」宣傳繪葉書、《台灣之茶葉》雜誌封面，以及茶葉外銷包裝，皆作傳統婦女採茶的圖形設計(圖 7、8、9)。甚至在當時大甲及平鎮車站的紀念戳章圖案中，除了草帽、茶葉等當地特殊產業外，皆分別有勤勞工作之台灣女性圖像的設計(圖 10、11)。

日治之前台灣婦女的穿著打扮，大致與閩粵原鄉相同，典型純樸的台灣美女，通常是身著「大絢衫」、「琵琶裙」等傳統服飾，並具有纖細的纏足與「鮎魚嘴、柳葉眉、月牙面」姣美面貌(註 14)。因此，當時有關台灣宣傳繪葉書，亦時常利用穿著打扮異於日人的傳統婦女為主題，以表現殖民地台灣之特殊生活與風俗文化(圖 12)。所以，除了前述具有傳統勤勞美德的台灣女性外，此種穿著台灣傳統服飾，並具有儒漢道德禮教約束下的溫雅婉約、恬靜嫻熟特質之台灣傳統女性，也是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中常用以傳達台灣意象的女性圖像，透過這些不同於日人之台灣傳統女性圖像的設計運用，以作為有關台灣意象之強調與殖民地台灣特色之表現。例如日治初期日商在促銷化學肥料的宣傳海報，即是利用畫面中的純樸台灣農家少女，以吸引消費者對此新產品的認同、喜愛(圖 13)；而「台灣茶商公會」發行的茶葉外銷宣傳海報、廣告，更時常利用穿著傳統服飾的典型台灣女性作為設計之主題，以強調出殖民地台灣的產品特色(圖 14、15、16)。由當時各種美術設計作品中可以發現，這種利用台灣傳統女性圖像傳達台灣產物特色之表現手法，在當時普遍使用於各種台灣特產之包裝、廣告設計中，例如外銷茶葉、香蕉、鳳梨罐頭的宣傳海報或外觀包裝，即時常會出現此種以人物圖像為主題的設計表現(圖 17、18)。



圖1 「台灣生活」繪葉書 1920年代



圖2 「台灣生活」繪葉書 1920年代



圖3 《民俗台灣》的「台灣圖繪」插圖設計 1941年



圖4 《常夏之臺灣》封面設計 1932年



圖5：「ライオン洗濯石鹸」宣傳海報 1930年代



圖6 「改良蔗作」宣傳海報 1942年



圖7 「台灣茶葉」宣傳繪葉書 1930年代



圖8 《台灣之茶葉》封面設計 1919年



圖9 「台灣烏龍茶」包裝設計 1930年代



圖10 大甲車站紀念戳章 1932年



圖11 平鎮車站紀念戳章 1934年



圖12 「台灣風俗」繪葉書 1920年代



圖13 進口肥料宣傳海報 1920年代



圖14 「台灣茶葉」宣傳海報 1920年代



圖15 「台灣茶葉」宣傳海報 1920年代



圖16 「台灣茶葉」宣傳廣告 1930年代



圖17 鳳梨罐頭包裝標貼 1930年代

此外，當時以台灣一般家庭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商品，其廣告、包裝更是時常有此種台灣傳統婦女圖像的設計使用，藉以使消費者能產生親切的認同感，而達到宣傳促銷之目的。例如「全昌中西藥房」的藥袋包裝，以及「布袋製酒公司」的美人酒標貼，其畫面中皆有熟悉的台灣傳統婦女圖像之設計(圖 19、20)。



圖 18 「台中香蕉」宣傳海報 1930 年代



圖 19 「全昌中西藥房」藥袋包裝 1930 年代



圖 20 「美人酒」包裝標貼 1910 年代



圖 21 台灣女子中學的茶道課程學習

4-2 殖民同化政策下的典型日本女性圖像

由於「同化政策」為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一貫方針，所以日本統治者在台灣所實施的殖民教育，即是配合著各階段治台政策，以同化為目標，以漸進為手段。經由這種殖民同化教育，不僅提昇了殖民地一般民眾的基本能力，具備實業操作之技能，以達到殖民地產業資源開發之目的，並可藉以普及日語、涵養德性、培育忠良的日本國民性格(註 15)。因此，當時台灣的女子教育，除了是在既有的同化教育方針下，加強日語學習外，對於殖民地國家的國家觀念也極為注重，自基礎教育開始，即灌輸有關日本的特殊國體、天皇制度與日本國民等觀念，以達成與日本同化之最終目標(註 16)；並更進一步培養台灣婦女具有各種社會、倫理的基本認識，以及

仁慈忍耐、寬大安靜、淑貞柔順的日本傳統女性美德。

所以當時以台灣學童為教育對象的公學校，在課程中特別有針對台灣女學生所安排的修身、裁縫、家事等教學內容。在 1912 年修訂的〈台灣公學校規則〉第 28 條中，即清楚指出女性學童需具備普通的家庭生活技藝和簡易的家事知識，並以養成勤儉、整頓、周密、利用的習慣為教育宗旨。因此，當時台灣各階段的女子教育大體上是以精通日語、培養基本國民性格、涵養婦德和傳授各種家庭生活知識為旨（註 17），也就是結合了殖民教育和日本國內女子教育，以塑造具有傳統日本美德的殖民地女性。例如當時女子中學校課程中的家政課，除了一般縫紉、烹飪等家事訓練外，並有日本傳統的插花與茶道課程的安排學習，以培養學生具有日本傳統女性生活之各項基本才能（圖 21）。

日治中期之後，日人以「同化政策」及「內地延長主義」作為當時主要的殖民統治方針，因而更有計劃地引進日本文化於台灣，在台北人的日常食、衣、住、行生活中推行各種日本生活文化與習俗，以改造台灣成為適合日人居住的理想殖民環境。所以當時官方宣傳媒體，亦會利用具有日本傳統色彩的台灣女性圖像，以宣揚其對殖民地台灣之同化成效，以及作為殖民地台灣之意象傳達。除了透過殖民政策及殖民教育的計劃性對台人進行同化外，日治之後，隨著殖民統治者而來日式生活方式以及日本商品，亦對於台灣傳統生活有明顯的影響。這些大量輸入的日本文化與日本商品日漸為人們所喜愛，並形成一種新興的流行與時髦象徵，甚至在強勢的殖民角色扮演下，使得日本文化在殖民地台灣成為當時的「主流文化」。由於日本進口的日式商品或日商製造的商品，在市面上廣為人們所喜愛，甚至成為本土業者模仿的對象，所以當時許多商店或商品為了提昇形象，在其促銷的淘報、廣告等宣傳媒體中，常會作日本風格或日本服飾裝扮的人物設計（圖 22、23）。例如「台灣茶商公會」發行的茶葉外銷淘報，以及總督府發行的香蕉宣傳淘報，除了上述作傳統台灣女性圖像主題的設計外，並且還利用穿著日本服飾的美女作為台灣茶葉、香蕉的代言宣傳，以提昇產品的形象及強調日本殖民地的產業特色（圖 24、25）。

日治時期除了台北的日本婦女穿著日本服裝外，有些社經地位較佳、生活環境較好的台灣女性，有時亦會仿效日人的衣著打扮，所以當時穿著日本服飾的婦女，常能藉以顯現其特殊的身分地位。因此一些以家庭主婦為銷售對象的日用百貨商店或家庭用品，遂常利用穿著日式服裝的婦女作商品廣告宣傳，用以提昇其商店或商品的優越形象。例如 1933 年「台北酒煙草賣出聯合會」舉辦的「歲暮商品拍賣會」宣傳淘報，以及大稻埕「東南茶棧」的促銷淘報，皆是以穿著和服的台灣婦女作為設計表現之主題（圖 26、27）；日商生產的「龜甲萬醋」、「福福乳劑」殺蟲藥、「安白蚊香」等家庭用品廣告設計，則同時以日式穿著的婦人圖像作為產品之宣傳代言（圖 28、29、30、31）。

在當時的藝術設計中，日本式的婦女圖像，除了是較為優越生活與優良品質的象徵；並且改變台人成為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一直是殖民統治者的最終同化目標，所以除商品廣告外，官方的政策宣傳設計，有些亦利用身著日本服飾的婦女圖像，隨時作日本生活同化之宣傳。例如 1930 年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郵局）所發行的儲蓄宣傳淘報，即以穿著日本服裝的婦女圖像，作為設計表現之主題（圖 32）；由官方宣傳機構《台灣日日新報》所出版的《台灣日日寫真畫報》，幾乎都是以各種日式生活中的婦女圖像，作為封面設計之主題，以加強日本生活文化之同化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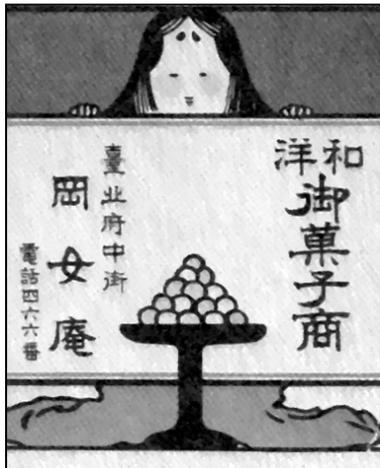


圖 22 進口日式商品的廣告 1920 年代



圖 23 日本進口商品廣告 1933 年



圖 24 「台灣茶葉」宣傳海報 1920 年代



圖 25 「台灣香薯」宣傳海報 1930 年代



圖 26 「歲暮商品拍賣會」宣傳海報 1933 年



圖 27 「東南美茶棧」宣傳海報 1930 年代



圖 28 「龜甲萬醬油」廣告 1936 年



圖 29 「龜甲萬醬油」廣告 1937 年



圖 30 「福福乳劑」廣告 1933 年

傳(圖 33)。甚至從當時小學教科書或兒童雜誌的封面中亦可以發現,理想的日本式兒童生活也是殖民統治省的宣传重點,而時常利用穿著制服或日本服裝的男女兒童作為設計表現的主題(圖 34)。

由於當時台灣的各种美術設計,主要仍以台灣民眾為主要宣傳對象,所以為使一般大眾能對日本同化宣傳產生認同,除了上述各種日式生活中的婦女圖像運用外,有時更會在畫面中同時出現傳統台灣服飾穿著與典型日本裝扮的婦女圖像設計,例如「龜甲萬醬油」的報紙廣告,即曾作各種不同穿著的台灣婦女同時手持醬油之宣傳設計(圖 35);「高砂麥酒(啤酒)」的促銷宣傳海報,則以台灣與日本兩種不同穿著風格婦女共同飲用麥酒的画面,作為設計表現之主題(圖 36);《台灣婦人界》雜誌的封面,也曾出現中、日不同風格並存的台灣女性圖像設計(圖 37)。



圖 31「安住蚊香」廣告 19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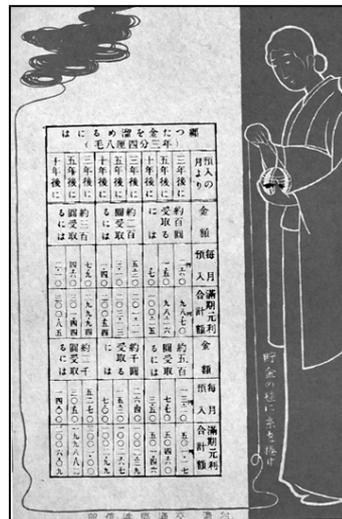


圖 32 總督府儲蓄宣傳海報 193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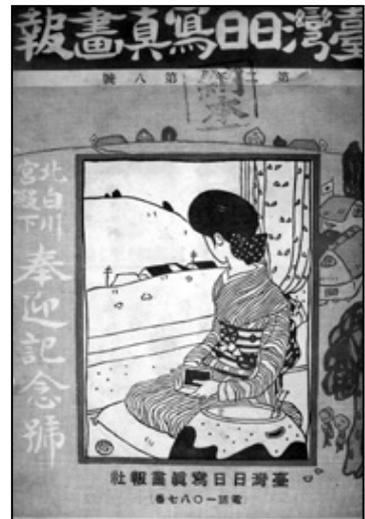


圖 33《台灣日日寫真畫報》封面 1936 年



圖 34《兒童繪讀本》封面 1940 年



圖 35「龜甲萬醬油」促銷廣告 193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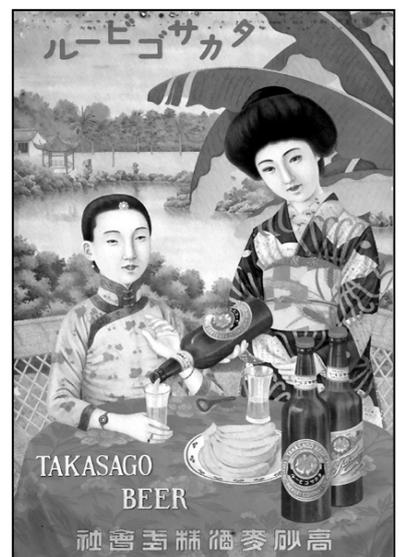


圖 36「高砂麥酒」宣傳海報 1920 年代



圖 37 《台灣婦人界》封面 1943 年



圖 38 「勝利牌留聲機」海報 1932 年



圖 39 「永安堂虎標大藥坊」海報 1933 年

4-3 社會變遷下的新時代女性圖像

由上述有關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發展中，已提及殖民政治環境改變，促使台灣社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不僅傳統生活型態受到了影響，一般民眾的思想觀念與社會文化發展，亦經由殖民教育的實施與外來文化的輸入而逐漸被開啓。此種社會環境變遷固然為殖民統治者的刻意推動，但有些卻是經由民眾的自動學習與民間團體持續性倡導、宣揚所獲致的結果，尤其是 1921 年由林獻堂、蔣渭水等有識之士所組織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推展的新文化運動，更是對台灣社會教育與現代文明提升有極為深遠的影響；此種由民間發起的文化啓蒙運動，對當時台灣人知識與思想啓發，以及對台灣文化的現代化建構具有積極的正面意義。

此外，日治中期之後的民族自由思想與民族自覺國際思潮，亦對台灣造成了影響，使台灣人民開始透過各種管道追求殖民統治下的平等待遇，而促使日人對殖民地台灣採取文官統治的和緩「同化」政策。尤其在文化協會的推波助瀾下，台灣的年輕人更毫不保留地接受新文化與現代文明，而逐漸具有獨立思考與追求理想的能力與信心，台灣女性也由於經過現代化教育與知識文明的學習，而開始有不同於以往的觀念改變與形貌表現。

所以從日治中期的美術設計中可以發現，台灣女性圖像已能有別於中國傳統造形與日本傳統典型的新樣貌出現，女人逐漸從家庭、廚房等狹小空間跨足到以往男性主導的社會領域，她們自信地進出各種公共場所、參與各類社會活動、使用各種現代文明器物。經由各種進口商品與流行訊息的接觸與模仿，台灣女性也開始有短衫、裙子等西式洋裝服飾的穿著裝扮，而表現出現代進步、活潑健康的新形象。例如 1930 年代之後，台灣女性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的影響，亦開始有短髮捲燙形式的出現，從簡潔、清爽的短髮造型中，頗能顯現現代女性獨立自由的新形象(註 18)。其次，經由殖民教育中之「體能強健」訓練的教育要旨實施，以及殖民政策的「放足運動」推行，亦使女性身體的束縛得以解放，而形成了充滿健康、活力新女性時代的來臨(註 19)。例如「勝利牌留聲機」、「永安堂虎標大藥坊」促銷宣傳海報以及「八里坌水浴場」廣告，畫面中皆出現了身著泳裝、走出戶外的新時代健康女性(圖 38、39、40)。尤其，在日治初期由官方設置的「台灣登山會」倡導下，殖民政府更積極鼓勵青年學子進行登山活動以培養強

健的體魄與精神，所以促使了許多台灣年輕女性亦得以能夠與男性一樣進行戶外活動(圖 41)，例如古總督府的「台灣茶葉」廣告畫面中，亦出現了身著輕便服裝與男性同伴郊遊登山的健康女性圖像設計(圖 42)。這種具有健康容貌的女性圖像，遂成為當時常見的設計主題，例如「新高」的廣告中，出現了與男性在運動場上奔跑競賽的健康新女性圖像設計(圖 43)；而八堵車站紀念戳章圖案中，更有當時女性極少有機會參與的高爾夫球運動之揮杆姿態圖形設計(圖 44)。



圖 40 「八里海水浴場」廣告 1934 年



圖 41 「運動用品」廣告 1928 年



圖 42 總督府「台灣茶葉」廣告 1935 年

古現代文明衝擊的社會環境下，台灣女性由於接受教育吸收新知，而具有專業能力與信心，於是逐漸走出傳統以勞動操作為主的家庭生活，開始有各種休閒生活或社會參與，除了上述的戶外活動外，閱讀、聽音樂、繪畫、泡茶、喝咖啡、逛街、購物…等活動，有時亦成為日治中期台灣女性的休閒內容。例如《台灣新民報》的創刊宣傳廣告，即以具有學問、思想的現代台灣女性，作為設計表現的主題，以顯現台灣女性接受教育追求知識的新形象(圖 45)；1932 年開幕的台灣第一家現代百貨公司—菊元百貨，即時常以身材高挑、穿著流行的新時代女性圖像，作為廣告設計之主題(圖 46)；而「森林商行」的唱片廣告，更是有現代女性與男性同時出



圖 43 「新高」廣告 193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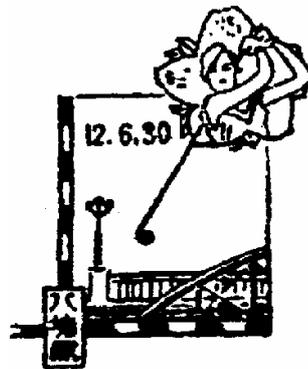


圖 44 八堵車站戳章 1937 年



圖 45 《台灣新民報》廣告 1935 年



圖 46 「菊元百貨」廣告 1932 年



圖 47 「今林商行」唱片廣告 1933 年



圖 48 總督府「台灣茶葉」廣告 1935 年



圖 49 「明治紅茶」廣告 1936 年



圖 50 「鳳梨罐頭」廣告 1934 年



圖 51 「白玉葡萄酒」廣告 1937 年



圖 52 「朝日」廣告 1936 年



圖 53 「台灣香蕉」宣傳海報 1939 年



圖 54 《台灣婦人界》封面 1942 年

現於咖啡廳欣賞唱片的畫面設計(圖 47)。而官方的茶葉廣告或民間廠商的紅茶、鳳梨罐頭、葡萄酒、果汁...等商品廣告設計,皆紛紛以穿著時髦、熱情悠閒之現代女性圖像作為宣傳的主題,以突顯其產品所具有之現代、進步的優良品質形象(圖 48、49、50、51、52)。甚至連台灣香蕉的宣傳海報,亦從早期傳統台灣婦女或日本婦女轉變為親切活潑的現代台灣少女(圖 53)。

除了學校教育外,當時台灣女性透過各種婦女家庭雜誌的閱讀,也能接觸、吸收到各種現代西方文明與生活知識,對於台灣女性的自我學習與充實,亦有具體的貢獻。這些雜誌的封面設計或內頁插圖,即時常作時髦現代女性的圖像設計,以迎合一般女性讀者的喜愛,例如當時台灣主要的婦女雜誌《台灣文藝》的封面設計,即曾出現各種穿著流行的現代女性圖像(圖 54);此外,首《台灣文藝》第三卷第七、八號的封面,亦同樣作現代女性圖像的設計(圖 55),其目錄頁更是有呈現現代都會女性多樣流行風貌的插圖設計(圖 56)。其次,首介紹台灣娛樂休閒的《第一時代》一書封面中,穿著嫵媚、姿態撩人的少女,更是社會環境變遷下的另一種新時代女性圖像(圖 57)。



圖 55 《台灣文藝》封面 1942 年



圖 56 《台灣文藝》目錄頁插圖設計 1942 年



圖 57 《第一時代》封面設計 1936 年



圖 58 街頭歡送出征畫面 194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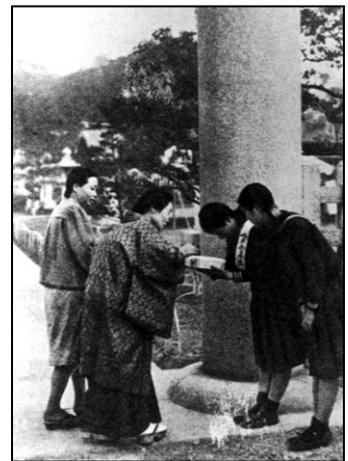


圖 59 街頭愛國募款畫面 1942 年

4-4 戰時體制下的殖民女性圖像

在日治時期的戰爭環境下，台灣女性也成為殖民統治者的戰時工具，也就是說日人基於國家利益，使用權力來支配女性以完成國家目的。除了前述有關當時台灣女性參與的各種戰時動員勞役外，此時台灣女性也在同化政策的殖民教育下，涵養了忠貞堅強的愛國情操，以因應戰時的國家體制，發揮日本皇國婦道傳統，達成修身齊家治國的目標，致力於皇民奉公下後方女性的基本任務(註 20)。即是透過各種方式灌輸她們如何在戰時體制下，體認身為「皇軍的勤助」及「後方女性」的伟大任務(註 21)，成為擔任戰場後方安定的重要角色。例如當時台灣街頭時常可見婦女歡送丈夫、兄長光榮出征的畫面，以及年青少女為前方戰場親人求繃「千人針」的景象(註 22)，或配合戰時國家政策進行宣揚軍威及戰爭募款的愛國行爲(圖 58、59)。

從當時各種戰時宣傳設計中可以發現，除了利用戰場上的英勇戰鬥、精銳武器作為設計的主題，以宣揚國家戰力、建立軍民信心，達到精神統戰之目標外，透過戰線後方的全民勞動、增產建設，以及聖戰、豐收的歡慶畫面，不僅可以呈現殖民地民眾的充分沉著備戰，國家的堅實戰力，以及克敵致勝的決心，並可藉以安定民心、激勵軍民的戰鬥意志與克敵制勝的信心；因此，在特殊時局氛圍下，透過女性主題的宣傳媒體運用，則更能有效傳達戰線後方的團結安定與全民充分備戰氣氛。例如當時有關「國土防衛」、「愛國儲蓄」、「徵兵保險」的主題，即時常出現於官方的政令宣導或民間商品廣告中，並且有許多是以戰場後方堅強勇敢的台灣女性圖像作為設計表現之主題(圖 60、61)；甚至有時連月曆也作戰爭宣傳的設計，表現台灣女性在戰場後方勞動生產的情形(圖 62)。此外，由官方發行的各種戰時宣傳刊物，更是常以台灣女性參與國家建設或戰爭準備的主題作為封面設計(圖 63)。

從此階段美術設計的台灣女性圖像表現中可以發現，台灣女性堅忍、勤勞的傳統美德，此時則更加地充分流露，除了表現她們參與戰場後方的生產和國防建設外，到了戰爭末期更有許多是以整裝從戎赴戰場或從前線醫護救助的巾幗英勇形貌，作為宣傳設計的主題。例如《時局歌集》、《台灣藝術新報》的封面，即以勇赴戰場上的英勇女性作為設計表現之主題(圖 64、65)；《戰時下救護 實際》的封面設計，則是直接利用參與救助工作的台灣少女圖像，傳達出前線戰火下救護的戰爭主題(圖 66)；防空宣導的《奉公防空習防空常識講座》一書，其封面則是作參與戰時勞動的台灣婦女圖像設計(圖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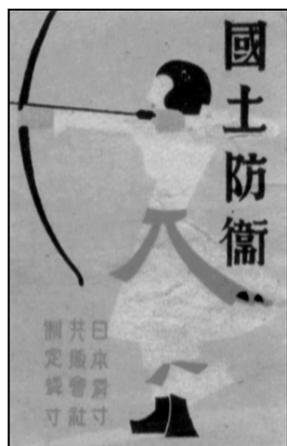


圖 60 火柴盒上的戰爭宣傳
1940 年



圖 61 「徵兵保險」廣告 1943 年



圖 62 戰爭宣傳月曆 1942 年



圖 63 《新建設》封面設計 1940 年



圖 64 《時局歌集》封面設計
1940 年



圖 65 《臺灣藝術新報》封面設計
1941 年



圖 66 《戰時下救護 實際》
封面設計 1943 年



圖 67 《奉公防空詳防空常識講座》封面設計
1941 年

五、結論

本文經由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中之「台灣女性圖像」所進行的分析、研究，不僅對女性圖像主題在此階段美術設計的運用情形有了初步的瞭解，並可進一步發現，日治時期特殊的殖民社會環境演變、發展，除對台灣人民的的生活、文化造成影響，也使得一向處於社會邊緣的台灣女性，面臨了許多的轉變與衝擊，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女性角色扮演，以及豐富多樣的形貌發展歷程。

台灣女性由於長久以來受到中國傳統儒教道德觀念所影響、約束，而以家庭為其主要的生活中心，並被形塑成為男性權力社會之依附者。日治之後，雖然受到了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以及外來文化的衝擊，但傳統儒教文化規範下的台灣女性，仍然保有勤於家庭、服從男性、相夫教子等傳統美德及生活方式。這種異於日人的台灣傳統女性圖像，遂時常成為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中用以傳達殖民地台灣意象之特殊視覺符號與表現主題。

在日人殖民同化教育政策下，除了使台灣女性得以有機會進入學校接受現代教育，而學習日語、生活技能與家庭知識外，更使日本皇民精神與傳統生活文化透過女性教育的快速傳播，以達到塑造具有傳統日本美德的理想殖民地女性。在官方同化政策及日本強勢文化影響下，此種具有日本傳統文化色彩的台灣女性圖像，亦時常透過各種美術設計的運用，而普遍流行。

日治中期之後，隨著教育的普及與社會環境的轉變，不僅使台灣年輕人逐漸具有獨立思考與追求理想的能力與信心，台灣女性亦開始不同於以往的觀念改變與形貌表現，而以有別於中國傳統與日本典型的新樣貌出現。所以當時美術設計作品中，亦出現了在現代文明影響下，充滿自信、健康活潑，以及追隨流行時髦的新時代台灣女性圖像。

日治末期戰爭環境下，台灣女性被日人灌輸了「皇軍勤勞」及「後方女性」的偉大任務，她們不僅要盡職於戰爭環境下的家庭安定，以及參與戰場後方的生產建設、戰爭宣揚、義務勞務等工作，有些更被迫遠赴前線戰場從事傷患救護或慰勞服務的艱辛工作。因此，從當時各種戰時宣傳媒體與美術設計作品的女性圖像中，可以發現台灣女性在此特殊戰爭環境中所表現之堅忍、英勇、愛國的另一種形貌。

註釋

1. Arnold Hauser 著，居延芳譯，1998，藝術社會學，台北，雅典出版社，p.33。
2. 郭繼弘，1984，籠入地於形內——藝術史與藝術批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pp.27-28。
3. 葉蕭科，1993，日落台北城——日治時代台北都市發展與台人日常生活，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pp.7-11。
4. 同上註，pp.12-13。
5. 引自李天和著，郭輝編譯，1977，日據下之台政，台中，台灣省文獻會，pp.164-166。
6. 林茂弘著，林詠楸譯，2000，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p.275。
7. 時報文化編輯委員會，2000，珍藏 20 世紀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8. 東鄉實、佐藤四郎，1926，台灣殖民發達史，台北，晃文館，p.480。
9. 呂理州，1994，明治維新——日本邁向現代化的歷程，台北，遠流出版社，pp.221-250。
10. 楊雅惠，1993，日據初期的台灣女性與皇民化運動，台灣風物，第 43 卷，第 2 期，pp.69-71。
11. 台灣總督府，1944，台灣決戰非常措施實施要綱，台灣時報，四月號，p.95。
12. 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p.46。
13. 游鑑明，1987，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pp.53-58。
14. 片岡巖著，陳孟日譯，1996，台灣風俗誌，台北，眾文圖書公司，pp.82-91。
15. 台灣總督府編，1919，台灣總督府府報，第 1735 號，p.1。
16. 蔡進雄，1998，台灣地區女性教育的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 5 期，p.102。
17. 陳惠慧，1999，大稻埕直隸人地圖——婦女的生活空間近百年的變遷，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pp.99-100。
18. 蘇旭梧，1993，台灣閩族婦女傳統服裝的設計與變化 AD1860-1945，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p.128。
19. 詒佩賢，1994，塑造殖民地之國民——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pp.38-43。
20. 柳本真吉，1941，大日本婦人會新竹州之「週刊」迎，新竹州時報，第 52 號，p.82。
21. 佚名，1941，軍國一封決意，新竹州時報，第 51 號，pp.44-48。
22. 「千人針」係一種為出征軍人祈福的日本傳統風俗，由一千人每人一針由布上縫繡製成戰時束腹腰帶，以祈求平安。千人針通常是由出征軍人的女性家人站在街頭，請求路人縫繡而成，此種習俗在戰爭時期亦普遍在台灣流行。

The Research of “Taiwanese Female Icons” in the Graphic Desig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Tsun-Hsiung Yao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mail:yaotsun@ntit.edu.tw

(Date Received : February 18,2002 ;Date Accepted : July 30,2002)

Abstract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this research explored and analyzed “Taiwanese female Icon” in the graphic desig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Meanwhile, in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Arts”, it sought to present analyses, descri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aiwanese female icons” from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n other words, it was to examine, categorize, and define the information and sources collected in the fieldwork through the synthesizing method of the qualitative studies of ground theory, and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a and meanings of graphic design of various “Taiwanese female icons” at the time. This study has realized that the graphic design of “Taiwanese female icon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follows: the Confucian-influenced traditional Taiwanese female icons, the Japanese-like female icons under the force of colonial assimilation policies, the modern female icons swayed by the change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olonial-type female icons under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war time. Through the categorizations and analyses of the “Taiwanese female icons” in graphic desig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female, as well as the social messages implied in the graphics, are clearly defined.

Keywords :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Graphic design, Female icons.